

受了重大衝擊，房地產價格自90年代高峰時期下跌超過70%，股票資產跌幅超過80%，給日本企業和家庭造成了1500多萬億日元的財富損失。

更為嚴重的是，日本政府在危機處理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政策反復和協調失衡。1991-1998年的8年裡，日本更換了7位首相，政局的頻繁更迭導致經濟發展思路反復調整，政策缺乏連續性和一致性。日本央行雖然連續9次降息，將利率從1991年的6%降至1996年的0.5%，但由於股市和地產價格雙雙大幅下跌，貨幣政策最終落入了“流動性陷阱”，無法扭轉貸款和貨幣供應增速的持續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中國市場給予日本擺脫困境極大的助力。故此日本內部出現了一股“安保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思潮，中國成為日本關鍵經貿夥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尤其是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中國市場對日本經濟的重要性持續攀升。中國是日本最大的交易夥伴之一，日本的汽車、電子、機械等支柱產業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需求。例如，豐田、本田等日本車企在華銷量占其全球銷量的20%以上。中國還是日本農產品、高端零部件的重要進口來源地，雙邊貿易額長期保持在3000億美元以上。

同時，中日產業鏈深度融合，中日在製造業產業鏈中形成互補格局。中國為日本企業提供廉價勞動力、廣闊市場及基礎工業配套，日本則向中國出口高端零部件、技術設備等。這種深度綁定使日本經濟難以脫離中國市場獨立發展。因此，日本的右派順勢提出“政經分離”的策略，也就是說，在政治上堅持有的一套，經濟上則維持與中國的緊密聯繫。

對華政策“自傷”經濟

然而，高市早苗在這次競逐自民黨總裁勝選之前任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提出“經濟問題安全化”，以所謂“保護日本免受危險”為由，強調需要“監視日本的鄰國，特別是中國”。她推動了一系列經濟安全措施，包括供應鏈多元化、出口管制和更嚴格的外國投資審查，尤其是配合美國主導的遏制戰略。例如，在半導體領域，推動構建排除中國的“晶片四方聯盟”，試圖將中國隔絕在美國主導的國際供應鏈之外，同時以“保護敏感技術”為由，對中國進行污名化指責，密切監視中國相關經濟活動。事實上，高市早苗的所謂在關鍵領域減少對

中國的依賴的政策，也“自傷”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

如果高市早苗政府一味追隨美國的對華遏制戰略，將導致日本企業失去這一巨大市場。以半導體行業為例，日本企業在半導體材料、設備領域具有較強競爭力，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占全球份額超過40%。若日本配合美國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將直接打擊其本土半導體產業。類似情況還出現在汽車、機械、電子設備等多個行業，這些行業共同構成了日本經濟的支柱。

此外，高市早苗的政治右傾立場核心是追求日本“軍事與經濟雙重自主”，擺脫戰後秩序束縛。為此，她力主修憲擴軍，要求將軍費提升至GDP的5%以上。這種政策組合將進一步加劇日本本就嚴峻的財政狀況。截至2023年，日本政府債務餘額占GDP的比例已超過260%，為發達國家中最高水準。增加防衛開支意味著要麼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要麼擠佔其他重要領域的支出，如社會保障、教育與科研等，這些都將對日本長期經濟增長潛力造成損害。

再就是，高市早苗的右傾理念，也不利於本地區的經濟合作。日本作為RCEP的成員，是極大的獲利方，日本經濟界也要求自民黨政府積極推動包括中國在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在新能源、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強化合作，將日本在混合動力汽車、氫能源技術方面的優勢，和中國在電動汽車、光伏、風電等領域已形成規模效應的市場結合；同時，中日兩國可在科技創新上合作，在人工智能、物聯網、生物技術等前沿科技領域通過共建聯合實驗室、共同資助研發專案等方式加強合作。中日企業還可攜手開發第三方市場，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將日本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與中國的成本和效率優勢相結合，實現互利共贏。

日本又處於一個歷史十字路口，石破茂說希望高市早苗帶對方向。說實話，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日本的四倍，任何的反華力量都阻止不了中國的復興，倒是高市早苗要正視現實，順從歷史潮流，既為她自己留名也為了日本的國運。要走出“迷失的30年”，日本不能不改善與搬不走的鄰居中國的雙邊關係。



掃碼聆聽原文



掃碼閱讀原文